

字上看,正面语句很少,大多数都是对反面的描述与批评。简文从正面铺陈“度君”用人情况时,还假设“如前处既若无察”的情况,这也是从解决弊端出发,以至于即便讲述正面情形,也还要假设负面问题,并把解决问题落实在“良人”上,而这是作者提出的用人方案的关键。

在简文第二部分,“党贡”所说的如下内容比较费解:

余无罪而湓(屏),须事之禺(遇)殲(机),璽(遇)元(其)毀,顛(美)亚(恶)乃出,从取贖(资)女(焉)。

“党贡”是通过乡党贡选得到了任用的那类人,他们把自己能脱离被摒弃而得到任用,归因于“遇机”,而这个“机”是“毀”之“机”,在他看来,政治败坏的时候美恶才能够辨别出来。这道理与“时穷节乃见”相近,颇有合理处。问题的关键是,党贡为什么会这么说?仅仅是合理吗?我们认为,党贡以“毀”作为得以任用的时机,反映了作者对于当时时代的判断。简文主张“以度”贡选人才,恰是作者认为当时已经是“毀”之“机”了,“良人”有了这种条件才可以得到任用。

总而言之,这篇简文写作于政治败坏背景下,作者针对时弊,认为“以度”“党贡”“良人”是改变当时恶政的途径。简文中,有着或显或暗的对这一背景的呼应。

余 论

简文的写作时间,或可作简单推测。前文已经推断,简文写作于乡党制度的背景下。我们怀疑,简文的写作时代上限是春战之际,下限是战国早期末。简文主张“以度”“党贡”“良人”这一“人为”的努力,改变已经“倾圮”的“天命”,实质是轻“天命”而重“人为”。^①这一思想在西周春秋时期恐难形成,而战国时代惨烈的兼并战争,世官世禄的世卿制度消亡,“士”阶层的崛起,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天命观”,在“天人关系”中,“人为”随之得到注重。战国早期各国变法,国野之界逐渐消解,而依托血缘的乡党制度渐渐被表地缘关系的郡县制所替代。这个过程,基本在战国中期之前完成。简文仍在乡党制度背景下,写作时间应不晚于战国中期之前,即下限为战国早期末。

清华简《天下之道》初探^②

程 薇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DOI:10.13613/j.cnki.qhdz.002803

《天下之道》是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收录的一篇与武事相关的简文,经整理小组观察,其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及清华简第七辑收

① 这一看法来自黄德宽的启发。据他告知,安大简有篇简文,与本简文的天命思想相近,都是重“人为”。

②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清华简《尚书》《逸周书》类文献专题研究”(2016THZWYX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先秦两汉讹字综合整理与研究》(15ZDB095)的阶段性成果。

录的《赵简子》《越公其事》系同一书手,这位抄手的字体特点如李守奎先生所观察的,其书写“工整,谨严整饬,字体略呈扁平状”。^①另外,从目前已经公布的简文可以看到,这个书手所用的竹简长度一般约41—45厘米,宽约半厘米左右,其所抄的几篇简文均无篇题,无编号,而简背皆有划痕,以上几篇简文的次第都是结合内容及简背划痕等来排定的。^②

《天下之道》完简长41.6厘米,宽约0.6厘米,原无篇题、无编号、简背有划痕,三道编,经整理编联该篇简文由7支简组成,或说其中的第6支简与本辑收入的《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简背划痕可以衔接,系同一书手所抄,但两者内容上没有丝毫关联。据整理小组贾连翔博士观察,这种现象只可以“说明这两部分内容是同时抄写,但划痕不能作为它们编联的绝对标准。至于两部分内容的关系,还要核对所有书手甲抄写的竹简后才能有认识”。^③目前的简序是依简背划痕信息及简文的内在逻辑来排定的,现篇题取自第1支简的前4字。

简文作者围绕得天下之道展开论说,通过今昔对比,论说了具体的守之器、攻之器、取之器及布阵等的核心因素是民心。其中第1支简至第4支简属于本篇简文的第1段和第2段,其内容是:

天下之道式(二)而改(已),式(一)者獸(守)之=(之之)器,式(一)者攻之=(之之)器。今之獸(守)者,高元(其)城,深元(其)池而利其植櫓,蒿元(其)飮(食),是非獸(守)之道。昔天下之獸(守)者,民心是獸(守)。女(如)不旻(得)元民之情爲(偽)肯(性)教,亦亡獸(守)也。今之攻者,多元(其)卓兵,至(臻)元(其)檀階,以登(發)元(其)一日之妄(怒),是非攻之道也。所謂攻者,堯(乘)元(其)民之心,是胃(謂)攻。女(如)不旻(得)口口^④之情,亦亡(無)攻也。

需要说明的是,第1、2简背的划痕连贯,第1简在划痕位置断裂,但简文完整,满简43字(含两个重文),有三处墨点,与第2简内容衔接完整。第2简共书23字,有章节符,文尾以下留白,近划痕处残断。第3、4简也是简尾残断。第3简书40字,疑缺两字,缺字可以据文义补齐。第4简共书6字,有章节符,章节以下留白,残断处对简文释读没有影响。

简文没有太多理解障碍,但还是有几个难字需要讨论:

1. 植櫓,整理小组有三种理解:一说读为屏障;一说读为“甲干”;一说读为渠檐。按,植櫓与下文的檀階相对,檀階为攻城器械,植櫓当为守城器械。《墨子·备城门》:“城上之备:渠檐、藉车……”《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六韬》篇“毋冲龙而攻,毋渠檐而守。”《淮南子·汜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檐以守。”足见渠檐在城守中的作用。

2. 情伪性教,简文这里的“情”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人的感情,与“性”相为表里,^⑤另一方面则是指实际的情形,^⑥“情伪”连言,常表示虚实的情况,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言晋文公“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性”是指人先天的本性,而“教”则是后天的教育。情伪性教连言,是指人方方面面的情况,与人心相关。

3. 檀阶即冲阶,系两种重要的攻城器械。冲即冲车,或称冲隆;阶指攻城的云梯。《墨子·备梯》:“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淮南子·兵略》:“故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

简文开篇即言“天下之道二而已,一者守之之器,一者攻之之器”,作者一方面说天下之“道”有

①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112页。

② 《郑武夫人规孺子》(原无篇题、编号,简长45厘米,宽0.6厘米)、《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原无篇题、编号,简长45厘米,宽0.6厘米)和《子仪》(原无篇题、编号,简长41.5—41.7厘米,宽0.6厘米)、(七)《赵简子》(原无篇题,无编号,长约41.6厘米,宽0.6厘米)和《越公其事》(原无篇题,无编号,简长41.6厘米,宽0.5厘米)

③ 据贾连翔博士编联意见,待刊。

④ 此处为第3支简的简尾,残缺了二字,从上下文来看,所缺之字应为“其民”。

⑤ 《孟子·告子上》载“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善矣”,赵岐注“若,顺也。性与情相为表里。”

⑥ 《孟子·离娄下》言“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二,紧接着却是说“一者守之之器,一者攻之之器”,讲的却是二“器”。按照古人的说法,“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道与器并非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一句话应该是“天下之道二而已,一者攻之之道,一者守之之道”,而且简文后面也明确论述的是“攻之道”和“守之道”,而否定了攻之器和守之器,似乎更能证实简文此处的表述有逻辑的错误。不过,仔细研读之后,我们感觉此处可能是作者有意的处理。因为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无论是进攻或是防守,大家考虑到的可能都是些具体的设施或武器装备,如简文中所提到的“高城”“深池”“渠檐”“冲梯”等等,但这些实际上都还是属于“器”的范畴。在简文作者看来,光有这种认识还远远不够,还只是拘泥于“器”的层面,而没有能够达到“道”的高度,所以作者强调天下之道有二。但是由于普通的民众还只能认识到器的层面,因此又表述成“攻之之器”与“守之之器”。作者通过这样一种看似奇怪的表达方式,以显示普通民众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着差距,从而突出认识“攻之道”和“守之道”的重要性。

那么“攻之道”和“守之道”的真正精髓是什么呢?简文的作者认为,关键就是要获得民心,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昔天下之守者,民心是守”,“所谓攻者,乘其民之心,是谓攻”,民心的向背才是决定战争攻守双方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思想贯穿着整篇简文的始终,是本篇简文所极力要阐述的观点。

清华简《天下之道》表面上看像是一篇论兵之作,但这篇文献可能并非出自兵家之手,而可能是一篇儒家的作品。

首先,这篇简文虽然是一篇讨论武事的文献,但其核心却不是在讨论军事战术,而是在强调民心向背对于军事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民本思想是先秦的重要思潮,许多思想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论述,^①不过在民本思想方面做过系统阐述、影响也最为深远的则是儒家,特别是孟子有大量的相关论述,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比如孟子曾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桀、纣之所以亡国,正是由于失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基于这一认识,他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间作出了重要的判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③把这些观点与清华简《天下之道》相比较,二者之间思想的一致性可谓一目了然。^④因此,在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眼中,以“民本”为核心的“仁政”原则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决定着战争是否正义,制约着战争的胜败,民心的向背成为了战争的起点和支点。他们甚至忽视军事本身的作用,强调只要获得民众支持,就可以“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孟子·梁惠王上》),获得军事的胜利,从而实现“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尽心下》)。清华简《天下之道》有着同样的思路和结论,这是我们把《天下之道》归之于儒家而不是兵家的一个重要理由。

其次,《天下之道》属于儒家的另外一个证据,是它主张要了解民众的“情伪性教”,而“情伪性教”也

① 如《管子·四顺》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晏子也强调要“以民为本”(《晏子春秋·问下》),《鹖冠子·兵政》亦称“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等等。

② 赵岐注“天时,谓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也;地利,险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乐也。”

③ 赵岐注“有坚强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为守。”

④ 荀子的思想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孟子,但是在关于军事的认识方面,荀子则与孟子有着惊人的一致。《荀子》一书中有专门的《议兵》篇,阐述了他对于军事的看法。在荀子看来,用兵之道的关键是要取得民众的支持,他强调“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因此,他主张“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只要取得民众的支持,众志成城,就可以克敌制胜。

正是儒家所强调的方面,《易传》的《系辞》有“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之载,而《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则言“太师慎维深思,内观民务,察度情伪”,都强调了解民众情伪的重要性。至于“性教”,更是儒家关注的焦点,《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以说是对《天下之道》中“性教”一词的最好注解。因此《天下之道》篇中这些论述,与儒家的思想主张也是非常吻合的。

第三,清华简《天下之道》虽然是一篇与用兵相关的文献,但对于兵学技巧却没有太多的涉及,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层面,这也是《天下之道》出自儒家之手的一个有力证据。“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有关军事的认识在诸子思想中都会多少有所体现。早期的儒家军事思想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将军事问题最大限度地从属于他们的政治伦理学主体。他们把自己关于军旅之事的观点,仅仅考虑为政治伦理学的具体注释。他们的军事思想中笼罩着过于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军事思想在其整个学说体系中的独立存在价值”。^①清华简《天下之道》正好体现着同样的特征,它关注和讨论的对象虽然是战争,但是它对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认识主要基于政治的角度,以为军事的因素微不足道,这种倾向在清华简《天下之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也是我们不能把它视为兵家著作的重要原因。

综上,清华简《天下之道》应该是一篇儒家的论兵之作。

那么,其抄写时间和著作者如何呢?清华简《天下之道》虽然很可能是一篇儒家文献,而且与孟子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它本身不太可能是孟子本人的著述。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清华简的抄写时间虽然是在公元前305年前后,属于战国中期的后半段,当时孟子本人还健在,但是从各方面情况来看,这篇简文不太可能出自孟子之手。

关于孟子著书的情况,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之已详。《孟子》原有《内篇》7篇,均流传至今;不过据赵氏说,《孟子》一书原来还有《外篇》4篇,即《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现已不存于世。但是赵岐本人已经指出,这4篇“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之也”,故这4篇本身亦不太可能是孟子本人的著述。从内容上看,清华简《天下之道》关注的是得天下的用兵之道,从篇题来看似不会与已经佚失的《外篇》4篇有什么关联。另外,我们看孟子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对话体的形式,也与本篇简文完全不类。因此清华简《天下之道》不会是孟子的著作,这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

清华简《天下之道》既然不是孟子本人所写,而且在孟子生前即已经被人抄录,这就意味着这篇文献不可能晚于孟子,甚至要比孟子还早。大家知道,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属于七十子和七十子弟子的学生,因此,这篇《天下之道》最大的可能,是出于七十子或七十子弟子之手,并对孟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孟子本人是思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这篇文献既然与孟子关系如此密切,其作者很可能就是一位思孟学派的先贤。由于文献有缺,其具体的作者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如果结合七十子或七十子弟子的活动时代来看,这篇文献的撰作时代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早期,最晚不会迟于战国时代中期的前半段。

另外,清华简《天下之道》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根据《左传》和《通典》等文献所引,兵家早期有一部重要的文献《军志》,该书虽然已经失传,但是从现存的一些佚文来看,该书的一些思想与清华简《天下之道》有共通之处。如《军志》中有“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之说,与《天下之道》强调民心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极为接近;另外,《左传》中曾经两次引用了《军志》中的一句话——“先人有夺人之心”,^②强调在战争中要先声夺人,这一思想虽然不见于《天下之道》,但是简文

① 黄朴民《早期儒家军事思想基本特征试探》,《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② 分别见于《左传》的宣公十二年(前597)、昭公二十一年(前521)。另外在《左传》文公七年(前620),赵宣子也提到了这句话,但没有注明是出自《军志》。

第三段在阐述攻取敌国的方法时有“邇之聾人以敎忘_二”的文句,这句话本身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说“归之谋人以悦之心”,或说是“归之谋人以夺之心”,意思是派遣智谋之士去获取民心的支持。“夺之心”很可能即是从《军志》的“夺人之心”发展而来。倘若如此,则《天下之道》的作者应该对《军志》一书也是非常熟悉的,应该是吸收了《军志》等兵家文献中的一些思想,并对其做了一些创造性的改造。因此,《天下之道》总的思想倾向虽然是儒家的,但是与兵家的一些主张也有共通之处。本篇简文与兵家之作特别是与《军志》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之,清华简《天下之道》是一篇与武事相关的文献,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其成书年代应该是战国时代早期,或者是战国中期的前半段,其思想与孟子的相关主张最为密切,应该是出自一位思孟学派的先贤之手。这是我们初步解读这篇简文所获得的认识。

清华简《治邦之道》篇补释^{*}

魏 栋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清华简《治邦之道》是与传世文献《墨子》思想关系密切的一篇先秦佚籍,“对于我们理解墨家的学说及其在战国时期的传播均有较好的作用”。该篇竹简文献的整理与释读存在缺简、编联难度大、字迹潦草模糊等困难,但整理者筚路蓝缕,迎难而上,已经做出高质量的释文和注释。由于整理该篇出土文献面临的多重客观困难,再加上出土文献内涵阐释往往并非一蹴而就的现实,《治邦之道》整理报告的个别之处尚存在可做其他释读的空间。现不揣谫陋,提出一些粗浅的释读意见,以为续貂。

一、“譬之人(女一如)草木而正岁时”

彼天下之锐士之远在下位而不由(训为被任用)者,愈自固以悲怨之!彼圣士之不由,卑(譬)之犹岁之不时,水旱、雨露之不度,则草木以及百谷曼生,以不成。彼春夏秋冬之相受既顺,水旱、雨露既度,则草木以及百谷茂长繁实,无蠹以熟。故卑(譬)之人草木,而正岁时。(简5—7)

整理报告对“卑(譬)之人草木”的注解云:“此句谓以人譬之于草木。简文草木之后亦有句读符号。”按,划线文句中之“人”字字形作,当为“女”字讹书,此“人(女)”字当读为“如”。古文字中“女”常可读为“如”,《治邦之道》篇中除此例外还有3例,简17:“女(如)可,以佐身相家。”简18:“上女(如)以此巨观焉,则可以知之。”简19:“女(如)无能于一官,则亦毋弼焉。”下面主要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与儒家经典的形成发展研究”(16ZDA1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出战国竹简地理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8CZS073)以及第6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项目“清华简楚国地理史料综合整理与研究”(2017M620033)阶段性成果。